

抗战时期“南明”语境的形成与史学表达^{*}

谢贵安

【提要】 由于抗战的爆发和流落西南的经历,大批知识分子对“南渡”有了切身体验,从而激发起对南明历史的普遍关注;社会上下形成了浓厚的“南明”语境,各阶层产生了强烈的历史代入感。不同政治力量都在南明史中寻找自己的历史镜像,以便在现实中作出相应的对策;而不同的学术派别受政治力量和个人观念的影响,对南明史进行了各自的史学表达。史实派以“史实呈现”为表达方式,史观派则以“史观引领”为表达方式。前者以南明帝王为中心,以纪传体为体裁,对南明史进行书写,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政府身上;后者则以农民起义军为中心,以唯物史观、阶级分析为方法,对晚明—南明史进行论述,把民族的命运寄望于下层人民的革命。

【关键词】 南明 语境 史学表达 历史镜像 隐喻

南明指明亡后在南方建立的与清相抗的明福、唐、桂、鲁诸王政权,南明史是指对上述政权记载和研究的史书和史学。“南明”概念起于康熙时陈鼎的《东林列传》,对南明史的书写出现于道咸间,如钱绮的《南明书》。但是,由于清朝对南明政权的打压和否定,用文化高压政策禁止使用“南明”概念、南明年号和正面记载南明历史,因此整个清代前中期“南明”概念仅见于陈鼎书中,以“南明”为书名的史书亦仅有钱绮之作。清末,排满反清运动的兴起,“南明”概念和南明史得以公开流行。随着清朝的灭亡,借“南明”以反清的政治意义消退,“南明”概念的传播和南明史的写作逐渐进入沉寂阶段。然而,抗战爆发,国民政府西迁,一大批文化人流落西南,“南明情境”得以“历史再现”,“南明”语境骤然形成,不同党派和学派不同程度地产生了“代入感”,在南明历史中找到自己的“历史镜像”,从而反观自己的身份角色。不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史料派还是史观派学者,都不约而同走进南明“历史情境”之中,分别从南明政府和农民起义军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历史镜像,各自言说并相互争鸣,形成各有特色的史学表达,促进了南明史研究和传播的勃兴,掀起南明研究的高潮。关于抗战时南明史的研究,前人已作过探讨,^①但从“南明”语境形成和史学表达角度探讨南明史学,则未见专题研究。本文尝试作一讨论。

一、南渡西迁与“南明”语境的形成

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南京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知识界人士纷纷“南渡”,大量流亡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史学与近代学术转型研究”(项目编号:16JJD770037)的阶段性成果。

^① 韩燕飞《抗战时期的南明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11年,第10—11页。

西南。“十一月十三日,国军西撤,淞沪沦陷。十二月,南都亦不守,悲愤填膺。”^①吴宓用诗句表达了被迫西迁和南渡的悲情愁绪“绮梦空时大劫临,西迁南渡共浮沉。”^②时局的骤变,让很多人明显感受到历史上的东晋、南朝、南宋和南明诸朝“情境再现”,对其中时代距离最近的朝代“南明”感触尤深。将当时退据的西南地理空间与南明历史时间相交叠,出现了“南明”的空前体认和谈论热情。几乎整个知识界都在应用“南明”的概念,寻找南明的旧籍,踏访南明的遗迹,观看南明的话剧和戏曲,阅读南明的小说,讲授和研究南明的历史,甚至不同的阶层和党派也将南明历史中相应的社会力量作为自己的历史镜像,由此在全社会迅速形成“南明”语境,使抗战前已趋沉寂的南明史研究被重新激活并形成热潮,一跃而成为显学。

将“南明”时间与“南方”(包括西南)空间相叠加的现象,并非始于抗战。早在清末排满时,革命党便曾以“南方”象征南明,以“南明”作为反清的寄托。民国建立后,强调“五族共和”的“中华”话语取代了排满的“南方”话语,使南明史研究热潮趋于沉寂。抗战爆发后,日本从东北向西南步步进逼,使“西南”成为“南明”的空间象征和历史场景。有学者指出,抗战时期,“无论是都城的移动,还是知识分子的播迁,都让人很容易联想起历史上的南渡经验。”这种“现实处境与历史经验的相互映衬”影响到知识分子的“言说方式”。^③随着南京、武汉和广州的相继陷落,这种“南渡”体验(确切而言是“西南”体验)更加深切而鲜明。

因战乱流落西南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觉察到时局与南明历史之间的特殊关联。被战争洪流裹卷至西南的黄裳明确指出“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大批地流转西南,人们感时伤事,仍旧对南明史事给予了特别的关怀。”他还指出,知识界对南明史的关注,“其实并非个人兴之所至,大后方文化界当时均卷入‘南明热’中矣”,^④并一再强调“当时人们对南明怀有如此浓厚的兴趣”。^⑤与黄裳关系密切的明史专家吴晗,在给黄裳的著作写序时提到,抗战时的“过路游客”都“在百忙中还上昆明和贵阳的图书馆”探寻南明历史,^⑥客观描述了当时普通文人对南明史的关注。

在南明历史激活和“南明”语境形成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们以各种方式“走进”南明历史的深处。

首先,进入西南的知识分子,纷纷搜访南明故书和南明史料。九一八事变后,朱希祖曾到广州双门底黄忠裕公祠拜访黄佛颐,“乃观其藏书之有关南明者”,发现“苏国祐之《易篲遗言》,及朝鲜人郑乔之《南明纲目》,为余所未有”。于是他“借《南明纲目》抄录一部,其书为五卷,阅读一过,觉其中材料,皆世所恒见。惟间亦有希见者,有朝鲜人所记录者,亦不可不参考之书也”。^⑦黄裳在回忆抗战入川时,说自己“遍访永历一朝遗书,搜求野史却极难得”。^⑧他承认自己买书偏好“南明史料”,^⑨以及“有关明清易代及南明史事的书”。^⑩明史专家吴晗提及自己流落西南,“原是抱着搜辑南明史料

① 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页。

② 吴宓《大劫一首》,吴学昭整理《吴宓诗集·南渡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28页。

③ 刘奎《危机与救赎:一个新文化人的“南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

④ 黄裳《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58页。

⑤ 黄裳《榆下怀人》,北京出版社2017年版,第92—93页。

⑥ 黄裳《来燕榭少作五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32页。

⑦ 朱希祖《广州征访南明史料记》,《中国学报》第1卷第1期,1943年1月。

⑧ 黄裳《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第58页。

⑨ 黄裳《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第265页。

⑩ 黄裳《榆下杂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后记”,第262页。

的大计划去的,十年来……先先后后买了百十种书,几百份碑帖”。^①

其次,踟躅西南的知识分子,亲自踏勘南明遗迹和缅怀南明英雄。黄裳自述“六十年前入蜀,更遍历滇黔,多见南明故迹,发生兴趣。”^②他甚至难以自拔,直到抗战胜利的一个多月以后,还“访问了昆明的一些历史遗迹,想写一篇谈论南明历史的小文”,凭吊了昆明茶馆附近据说是陈圆圆自沉的莲花池,“池边还有着两块刻了她的遗像的石碑。此外还有一块更小些的碑,它指出的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被吴三桂从缅甸捉回来杀死以后,焚尸扬灰的所在”。^③柳亚子于1940年末,乘“亚洲皇后”号船“南渡”,^④先是逃亡香港,后来避地桂林,最后逃难重庆。在这南明故地,本就致力于南明研究的柳亚子,更是常常踏访南明故迹,寻找历史的痕迹。1942年11月10日,他寻访桂林的瞿式耜、张同敞二人殉国纪念亭,写下《谒瞿、张二公殉国纪念亭有作》一诗,对瞿、张二人作了深切的凭吊,其中有句云“南明宗社莽榛芜,纪念亭留德未孤。”^⑤“这种今昔之感,表明南明往事实际上为战时的柳亚子,提供了精神的支撑与归宿。”^⑥

再其次,坐困西南的知识分子,开始创作有关南明的文学作品。郭沫若创作了歌颂南明少年英雄的《南冠草》戏剧。时为乐山武汉大学教授的苏雪林创作了描写南明忠臣烈士的小说集《蝉蜕集》,其中歌颂了被门生出卖遭清军逮捕而誓死不降的黄道周,以及独守桂林坚持抗清的瞿式耜等。流落四川江津等地的台静农(1902—1990年),因为战争丧乱的体验,使他对晚明—南明的历史产生兴趣,写成《亡明讲史》的历史小说,“翔实的记录明末王朝倾覆之际的种种事件”,“小说以清兵攻陷南京,俘虏弘光皇帝,大明基业烟消云散作为结束”。他的这部小说,被“看成是部讽刺国民政府的末世寓言”。^⑦

最后,流落西南的知识分子,将南明史引进大学讲堂。有学者用“另一种抗战”形容在大学讲授南明史的行为,称夏定域在看护《四库全书》期间,“又应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到浙江大学文学院任教,主讲《南明史》。对于在战火中的大学讲授《南明史》……从历史研究角度表达其不屈外辱、坚守民族大义之精神。”^⑧

这些流落西南的知识分子,感时伤事,开始了南明史的撰述和研究,形成了各有特色的史学表达。在笔者看来,抗战时期,南明史至少形成了两种表达方式:一个是以史料搜集和史实陈述为特征,另一个是以史实分析和史观引领为特征。前者可称之为南明史研究中的史实派,后者可称之为史观派。

二、南明史的史实呈现与传统困境

南明史的史学表达,与表达者的立场和价值观念相关。不同立场和观念的学者,对南明史会有

① 黄裳《来燕榭少作五种》,第332页。

② 黄裳《劫余古艳:来燕榭书跋手迹辑存》,第58页。

③ 黄裳《榆下怀人》,第92—93页。

④ 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31—32页。

⑤ 柳亚子《十一月一日,谒瞿、张二公殉国纪念亭有作》,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磨剑室诗词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4页。

⑥ 刘奎《危机与救赎:一个新文化人的“南渡”》,第57页。

⑦ 王德威《国家不幸书家幸——台静农的书法与文学》,《台大中文学报》第31期,2009年12月。

⑧ 晓汀《另一种抗战(二)》,《富阳日报》2016年2月7日。

不同的书写和表达方式。史实派南明史家主要秉持民族立场,为南明存史。在反抗异族的斗争中,他们以南明帝王为民族象征,编纂以皇帝为中心的纪传体,尽管这种史体曾遭到新史学运动的批判,但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还是成为史实派南明史家的首选。史实派的代表人物有柳亚子、朱希祖、钱海岳和朱荫龙等人。

史实派对南明史的研究肇端于清末,当时排满运动兴起,作为革命党人的柳亚子和朱希祖等人已开始关注南明史并注重保存南明史实,以期通过这种方式唤醒汉族的“民族”意识,达到排满的目的。钱海岳则在民国初期发现清修《明史》和民修《清史(稿)》中都忽略南明,心中不平,决心编纂南明史。抗战爆发后,他们的民族意识再次被激发,仍然用搜集史料、保存史实和编纂史书的形式来研究南明史。他们编纂的史书体例,无一例外采用了纪传体。

柳亚子(1887—1958年)是南明史研究中史实派的中坚。他一直致力于南明史料的搜集和编纂工作。即使他后来撰写了一系列南明人物传记,他亦将其称之为“南明史料”。谢国桢也注意到他在史料收集上的特长,指出柳亚子“自抗战军兴以来,专治南明史乘,不畏权威势力,发扬民族气节,对于南明史料,搜求不遗余力”。^①柳亚子曾经以番禺徐氏南州书楼所藏《皇明四朝成仁录补编》和《明季南都殉难记》两书为蓝本,辑补了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录》,“补苴掇拾,颇有微劳”。^②他在《自撰年谱》中叙称,1940年在研究南明史料的同时,“与钱杏邨(即阿英)通函讨论史料问题,又借观书籍,近百余种,获益甚夥”。他还从郑振铎处借得傅以礼长恩阁传钞本《南疆逸史》56卷,“以二十日之力,手写副本六册,又以十五日之力斟定之”。^③柳亚子费尽心力搜集、抄写和校定南明史料,他藏在香港羿楼的南明史料就多达数百种,并撰成《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一文。

在搜集史料的同时,柳亚子将史料进行梳理和去取,撰写南明史事。据其《自撰年谱》称,1939年“八月,辑《南明史纲》四卷,附《历日表》一卷成,自为叙”。1940年,“自四月至十月,研究南明史料,撰《夏允彝完淳父子合传》《吴易传》《孙璋传》《吴志葵传》《徐弘基传》《杨娥传》《赵夫人传》《郭良璞传》《吴炎潘程章合传》《王锡阐、戴笠合传》等十许首,俱文言文。又别撰《南明吴江抗虏烈士吴日生传》《江左少年夏完淳传》各一首,则为语体文。”11月,“辑《南明后妃宗藩志初稿》成,为南明史张本,钱杏邨怂恿之力也。”^④柳亚子的南明史研究计划,是在史料整理的基础上,撰写一部编年体的《南明纪年》、一部纪传体的《南明史》和一部纪事本末体的《南明纪事本末》,^⑤皆属于传统的叙事史学。不过,该计划并未完成。在他完成的文稿中,有《南明纪年史纲》和《南明后妃宗藩传》。前者属于典型的编年体,始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唐王在南京监国,止于永历三十七年(1683年)八月延平幼王郑克塽降清;后者属于列传,包括《南明后妃传》一卷、《南明追尊三帝传》一卷、《南明储贰传》一卷,以及《南明诸王传》和《南明宗室传》若干卷。柳亚子偶亦撰写考证论文,于1940年6月撰成《季明四帝谥法考》和《南明追尊三帝考》二文。

柳亚子的南明史成果始终未能形成完整的著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由后人整理成书《南明

① 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25页。

② 柳亚子《羿楼旧藏南明史料书目提要》,《文学创作》第1卷第5期,1943年2月。

③ 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31—32页。

④ 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第31—32页。

⑤ 柳亚子《致胡朴安》,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书信辑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5页。

史纲、史料》。^①该书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南明史纲初稿(八编)”,内容是从弘光帝到永历帝的编年,相当于“本纪”;另一部分是“南明人物志”,包括奇女传、义士传、遗民传、诸王传、宗室传、后妃传和复社名流吴日生传、江左少年夏完淳传,这部分内容相当于“列传”。因此,就柳亚子撰著来看,其南明史仍然属于纪传体史书。列传传主除了诸王、宗室和后妃外,主要是江南反清义士和复社成员,完全没有农民起义领袖,甚至没有南明后期的主要支撑者、作为张献忠余部的孙可望、李定国等人。

朱希祖(1879—1944年)与柳亚子一样,也属于史实派南明史家。作为历史学家,他对局势的观察超乎常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便敏锐地预见到南明历史即将重现。其婿罗香林指出:“会日本发起九一八沈阳事变,大举侵陵。先生痛国难深重,益欲纂述南明史乘”,恰逢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聘任其为该校文史研究所主任,朱希祖“以两粤为南明诸王兴兵抗满之所,适于搜集实地资料”,决定接受聘请,于1931年10月,“泛海南下,过江宁时,顺道访朱明旧院遗址,寻求明季史迹。在粤讲学,辄与南中人士,访古问奇,所得南明史料,及两广方志尤富。”^②对于他受聘中山大学的目,顾颉刚在吊朱希祖的诗中有解释“入粤为寻绍武来,金陵旧院拨蒿莱。平生心事南明史,历劫终教志不灰。”^③据朱僊在《先君逖先先生年谱》中透露,抗战前朱希祖为“备撰《南明史》,亦作笔记以记心得。时搜集南明史料,已至七百余种”。^④1937年七七事变后,朱希祖随中央大学西迁四川重庆,时时以南明史研究为怀。朱希祖“于萧梁及明季历史,尤悉力赴之”,于“南明史,则成《明季史籍题跋》六卷”。^⑤朱希祖在抗战期间撰写或发表的南明史论著,有《南明韩王本铉考》《南明广州殉国诸王考》《广州征访南明史料记》等。由此可见,朱希祖在南明史研究方面,主要是对史料的搜集和对史事的考订。他最终处理史实的方式是编写传统体裁的史书。根据其早年《编纂南明史计划》,知其“拟用纪、传、表、志旧法,以保存有用之史料,约六七十卷”。^⑥虽然他声称“与旧史不同”,但实际上仍然采用的是以叙事为主、以帝王为中心的传统纪传体,因此,他对南明史的史学表达,仍然属于史实呈现。朱希祖与国民政府关系较为密切,他提议设立国史馆并拟在馆中撰写南明史的计划获得批准。他以南明帝王为中心的纪传体书法,显然以南明政府为正统,并隐喻现实中的国民政府。

抗战时期,钱海岳(1901—1968年)对南明史的研究也采用了“史实呈现”的方式,即以传统纪传体为体裁进行南明史实的记录与表达。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既受到清史馆诸老的影响,也与朱希祖有直接关系。民国初,时在北京读大学的钱海岳,通过协修清史的父亲钱麟书,认识了清史馆修史诸老柯劭忞、缪荃孙等人,听他们说《明史》与《清史(稿)》中都没有南明史的一席之地,从而激发了撰述《南明史》的志向。抗战前的1928年,他在南京遇到南明史研究前辈、曾为清史馆馆员的朱希祖,后者鼓励他从事南明史的研究,并将自己的南明史撰述构想乃至史料都提供给他。据钱海岳自述“尝晤朱君希祖,希祖固治南明史而未遑成书者,相与往复,上下其议论,并承假史材,

① 柳亚子文集编辑委员会主编《柳亚子文集·南明史纲、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② 中华科学院编《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华冈出版部1971年版,第310页。

③ 李孝迁、任虎编校《近代中国史家学记》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第1176页。

④ 钱海岳《南明史》,中华书局2016年版,“卷首”,第4页。

⑤ 中华科学院编《中国文化综合研究——近六十年来中国学人研究中国文化之贡献》,第316页。

⑥ 朱希祖《编纂南明史计划》,《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月报》第2卷第7期,1931年1月。

颇窥羽陵酉阳之秘。”^①抗战爆发后,钱海岳随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历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室干事、国民政府考试院秘书、开国文献馆专门委员、新疆边防督办公署秘书处副处长、新疆女子学院院长兼该院中文系讲师,无论在哪个部门,他都不忘随身携带正在撰写的《南明史》书稿,不间断地撰述和修改。1944年,在明亡300年后,钱海岳终于完成了《南明史》初稿,“定为百卷”。^②因为需要修改和增补,其书并未付印,直到2006年,其遗稿才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定本《南明史》共有14册,120卷,359万余字;全书采用纪传体,包括本纪、志、表、列传四部分;记事始于崇祯十七年五月,终于永历三十七年。钱海岳采用纪传体例,既受清史馆诸老的熏陶,也受朱希祖的影响。后者在《编纂南明史计划》中就打算用纪传体来记载南明史。朱、钱二人南京相会,体裁的传授自是理情中事。钱海岳撰写《南明史》时,参考3400余种文献,钩沉抉微,爬梳考稽,从其熔铸史料和纪传体例来看,该书仍然是以史料考订和史实叙述为主,故钱海岳与柳亚子、朱希祖一样,也属于史实派的南明史家。

史实派以“史实呈现”的方式,对南明史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对西南地区散落的南明图籍、文物进行搜集、考察,对史料进行考订,对史实进行梳理,撰成南明史的论文和专书,既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局势,又促进了南明史热潮的兴起。然而,他们也陷入了无法自拔的“传统困境”。他们中虽然有些人参加过辛亥革命,也声称要用新方法来探讨南明历史,但因“救亡”而改变了“启蒙”的初衷,在民族危亡关头,毅然选择以南明帝王作为国家象征,不约而同地采用纪传体进行书写,难免落入以帝王谱系为特征的传统史学窠臼。他们将南明诸帝写入本纪,作为国家象征符号,期望凝聚人心,坚持抗战,但诸帝逐一被俘,南明终不免于覆灭,这对史实派来说是所无法克服的困境。而尝试克服这一难题、走出南明困境的,是史观派南明史家。

三、南明史的史观引领与现代超越

与南明研究中史实派的“史实呈现”相异,史观派的史学表达为“史观引领”。在史实派“走进南明”并深陷其中的同时,史观派南明史家却尝试在“走进南明”后,寻找“走出南明”之路。

史观派是指用唯物史观分析南明历史的学者,以郭沫若、翦伯赞、李文治和叶蠡生等人为代表。如果说史实派主要开展南明史料搜集和史书编纂的话,那么史观派则主要开展对晚明—南明史的分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跳过南明帝王及其政府,转而关注农民起义军的历史作用,以摆脱史实派所面临的困境。其途径有二:一是通过研究农民起义军,实现“新史学”的“史学下移”目标,同时也实践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二是通过总结晚明—南明农民起义军的成功经验和历史教训,克服农民军“流寇”思想和骄傲自满情绪,以便超越历史困境,让当前的抗战跳出南明的陷阱,走向最后的胜利。

郭沫若(1892—1978年)的“南渡”意象中,不是只有南明,还有楚国、南宋等,但他对晚明—南明的研究,却取得了轰动性的效果。郭沫若南明史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起初,他也像史实派史家柳亚子那样,重视表彰南明士大夫的抗清义举和气节,如曾经为《明末民族艺人传》写

^① 钱海岳《南明史》,“义例”,第1页。

^② 刘桂秋《钱海岳简明年表初编》,《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2年第10期。

序,表彰傅青主、八大山人、石涛等人“或起义抗敌,或不屈殉国”的精神;^①还创作了歌颂南明少年英雄夏完淳抗清的历史剧《南冠草》,撰写了《夏完淳之家庭师友及其殉国前后的状况》一文。^②但是后来,他脱离了上层精英路线,转而关注下层人民。1944年3月19日,在明亡300年纪念日,郭沫若发表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将晚明与南明放在一起进行探讨:“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③文中主要叙述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北京前后的经过,以及在此期间李自成、宋献策、刘宗敏、牛金星,特别是李岩的活动与思想。除了正面歌颂农民军的历史功绩外,郭沫若还总结了农民军失败的深刻原因。他认为农民军经过长期奋斗后,“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昏昏然”地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对“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④结果导致起义军失败的结局。如果李自成没有失败,“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郭沫若认为,李自成“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⑤这实际上把李自成农民军看成是使中国免受外族奴役的关键性因素。在此逻辑下,如若李自成成功,就是抗击外族入侵的成功。这实则是为“走出南明”困境寻找另一种出路。

翦伯赞(1898—1968年)与郭沫若同处一个阵营,从1940年至1945年,先后撰写或发表了《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桃花扇底看南朝》《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等文,“用唯物史观科学地分析了明朝和南明各政权的阶级实质、历史地位,揭露了它们的腐朽无能,歌颂了明末农民起义军,并对其经验教训作出了总结。”^⑥翦伯赞上述文章的主要内容,有以下两点。

第一,赞扬农民起义军英勇坚定的抗清斗志和爱国精神。上述文章指出,清军“诱降政策对李自成的集团是不可能”实现的。^⑦作者把英勇果决的农民军与隐遁逃避、多愁善感的文人士大夫和卖国求荣的降清官员作对照,称赞他们“当国家危急的时候,既不知道顺风转舵而被发入山,又不知道‘南望慨叹’而‘赋诗寄意’,更不甘心认贼作父,而委身为奴为虏,他们只知道拿起武器与敌人作生死的决斗,保卫国家,保卫民族”。^⑧他还充分肯定归顺南明的农民起义将领们的爱国立场:“清肃王又致书高杰诱降,但因高杰出身‘流寇’,富有爱国之心,终不为动。”^⑨他指出,“拥众三十万”的李自成余部李锦“所以归附政府者”,是为了“大敌当前”共御满清;^⑩认为“雄据滇黔,遥控川湘”的孙可望本可“称王称帝”却归附南明,“是为了要继承这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⑪他指出,永历政权“不肯

① 郭沫若《〈明末民族艺人传〉序》,傅抱石编译《明末民族艺人传》,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② 郭沫若《夏完淳之家庭师友及其殉国前后的状况》,《中原》第1卷第2期,1943年9月。

③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76页。

④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第195页。

⑤ 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卷,第203页。

⑥ 南炳文《辉煌、曲折与启示:20世纪中国明史研究回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

⑦ 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中国史论集》第2辑,国际文化服务社1947年版,第280页。

⑧ 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第10—11期,1945年12月。

⑨ 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281页。

⑩ 翦伯赞《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中苏文化》第8卷第1期,1941年1月。

⑪ 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第10—11期,1945年12月。

投降敌人者,非南明之缙绅,而亦‘闯贼’余孽李定国也。当李定国死后,‘连砦相结’据巴东之巫山以抗满清至十四年之久,以存明祀者,则又非南明之缙绅,而亦为‘闯贼’李自成之余孽李来亨、刘体淳、郝永忠也”。^①

第二,揭露南明政府的政治黑暗、生活腐化和抗清动摇。上述文章指斥南明政府对内专制、对外妥协的政策,指出“马士英、阮大铖等阉党余孽所执行的政策,显然是内除忠臣,外谋妥协,以求偏安江左的政策。”^②对内,南明弘光政府“又兴党狱,收捕复社诸生,摧毁文化,箝制舆论”;^③对外,南明政权时刻准备妥协,马士英、阮大铖“第一件事,便是企图与清谋妥协”,^④他们宁肯防内,也不防外,“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⑤他揭露南明官员生活腐化,指出弘光政权上至皇帝、下至大臣无不腐化堕落,“南明的君臣,开始了骄奢淫侈的生活”,“弘光皇帝,发布了征歌选舞的命令”。^⑥马士英、阮大铖等“公行贿赂”,“卖官鬻爵,贪污腐化”,“至于各级官职,都有定价”。^⑦当清军和李自成对南明虎视眈眈时,“当时的南京,却是一座纸醉金迷的城市”。^⑧直到清军兵临南京,“天子已无心求虾蟆,相公亦无兴斗蟋蟀,大家都要准备逃亡了”,^⑨结果满清的大军“在迎降的队伍中,走进了繁华的南京”。^⑩翦伯赞所表现出来的阶级分析方法和唯物史观与郭沫若一脉相承。

在史观派中,有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他就是李文治(1909—2000年)。他于1944年秋写成的作为《晚明民变》一小节的“南明政府的崩溃和新的生机”,在1945年改名为《南明的危机和生机》后正式发表。其观点基本上与郭沫若、翦伯赞相一致。

第一,李文治也对农民军抗清的行为进行高度赞扬。他在行文中,虽然时常称农民军为“流寇”,却从正面肯定他们的历史功绩,指出本应迅速崩溃的南明,却因为“国人的觉悟”和“流寇的归明”而现出了新的生机。当时全国各地“成千万的民众,参加了民族斗争。这些民众,有的苦于明朝的暴政酷敛,有的曾参加过流寇的队伍,现在都举起反清的义旗”。李自成、张献忠的余党,“在民族思想澎湃,反清复明运动高潮之下,由于外界的刺激和内心的自觉,也改变了原来的政策,起来共同支撑明朝的江山”。^⑪李文治还在《晚明民变》一书的“绪论”中,指出随着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的归附和支持,“明室便在他们挣扎扶持之下,多延长了十几年的历史”。这些农民军“先以政治经济的压迫之后,起而反抗官府;继以国家民族之休戚,转而扶明御清;这种转变是带有浓厚民族意识的”。与郭沫若一样,李文治也分析了李自成农民军失败的原因,指出李自成军队进入北京后,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腐化堕落,“他部下的将官,陶醉于奢淫享乐,士卒也逐渐腐化起来”。^⑫

第二,李文治也揭露南明的黑暗与腐败。他指出南明的崩溃“在政治方面,更十足表现了腐败”,

① 翦伯赞《论南明第三个政府的斗争》,《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

② 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281页。

③ 商辛《桃花扇底看南朝》,《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

④ 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277页。

⑤ 商辛《桃花扇底看南朝》,《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

⑥ 商辛《桃花扇底看南朝》,《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

⑦ 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286页。

⑧ 商辛《桃花扇底看南朝》,《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

⑨ 翦伯赞《南明史上的弘光时代》,《中国史论集》第2辑,第296页。

⑩ 商辛《桃花扇底看南朝》,《群众》第9卷第7期,1944年4月。

⑪ 李文治《南明的危机和生机》,《中央周刊》第7卷第18期,1945年4月。

⑫ 李文治《晚明民变》,中华书局1948年版,“绪论”,第2页。

如争权夺利,党争不断,“在福王由崧未即位之先,先有福王潞王的争立;即位之后,又有阉党马士英、阮大铖等对东林老臣的排挤。”如贿赂公行,卖官鬻爵,“官吏的升迁,不是攀党,便是行贿,致有‘职方贱如狗,都督满街走,宰相只要钱,天子但呷酒’以及‘文官爱钱不怕死,武官怕死又要钱’的谚语。”他还揭露南明君臣生活腐化,“弘光更是个淫奢无度不问朝政的天子”结果“文恬武嬉,暮气日深”。同时,士大夫们也“流连秦淮,召妓狂饮,沉迷于物质肉欲的享受”。^①

当然,时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的李文治,与郭沫若和翦伯赞等左翼学者又有所不同,在称呼上还保留了“流寇”一词,甚至认为南明时“流寇和外患的影响毁坏了农村经济基础”。^②但是,李文治与郭、翦二人在历史观上并无根本差异。他选择“晚明民变”作为研究课题,就是受到新史学和唯物史观的影响,将学术视野下沉至民史,重视下层群众的力量。其书名中的“民变”一词,与此前谢国桢的“奴变”一词相似,^③都是从社会下层研究历史,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李文治在《晚明民变考》中,较为正面客观地叙述和研究了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领袖,充分肯定晚明和南明农民起义军的历史作用,可见其深受唯物史观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文治得到“比较彻底地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自己的研究”的评价。^④这种取向在他早期的“民变”研究中已有显现。

此外,唯物史观派史学家叶蠖生(1904—1990年)在中共“七大”以后,于1945年6月16、17日两天,连续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三百年前农民起义军抗满联合阵线》一文,叙述“甲申”之变后,农民军长达21年的联明抗清斗争,以此论证建立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影响深远的“联明抗清”说由此奠基。

史观派在南明史上的史学表达,就是“史观引领”,即通过唯物史观来分析南明社会的阶级状况,指出腐败的南明政府无法承载抗清重任,下层人民及农民起义军才是抗清的中流砥柱。史观派试图通过寄望于民的方式,找到“走出南明”的新路径。

四、“南明”语境中的现实隐喻

抗战时期形成的“南明”语境,既包括南明“史学表达”的历史语义,也包括借南明史隐喻的现实立场和社会环境。各派政治力量与相应学者,都在“南明”语境之中进行现实的隐喻和政治影射。当时的主要政治力量,一是重庆的国民党,一是延安的共产党,两者都在南明史中寻找各自对应的历史镜像,进行自己“身份代入”后的历史观照。前者将晚明—南明政府视作正统并以此自居,后者则将农民起义军作为自身的历史映射。两大政治力量还彼此指称对方的历史身份。国民党早在1933年就把中共视为晚明的李自成。是年,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讲话时,指桑骂槐地说过“明朝之亡国,不是亡于满清,而是亡于匪乱。现在我们的国难,同明朝的情形差不多一样。”^⑤而在共产党眼里,国民党政府像南明政府那样腐败无能。

与政治力量在南明史中的“身份代入”相应,史学派别也在南明史表达中采取了明显的“史学隐

① 李文治《南明的危机和生机》,《中央周刊》第7卷第18期,1945年4月。

② 李文治《南明的危机和生机》,《中央周刊》第7卷第18期,1945年4月。

③ 谢国桢《明季奴变考》,《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附录一,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④ 《前辈名家·李文治》。http://ie.cass.cn/scholars/seniors_masters/201904/t20190425_4870148.html[2019-04-25]

⑤ 转引自张其昀《党史概要》,“中央”文物供应社1979年版,第708页。

喻”。以柳亚子、朱希祖、钱海岳等人为首的史实派,在抗战爆发、民族危亡之际,选择纪传体以寄望政府凝聚人心,借南明政府的抗清以表达抗日意志;以郭沫若、翦伯赞、叶蠖生等人为首的史观派,在日本侵略、国民党制造摩擦的双重威胁下,借晚明—南明农民军的抗清义举来表达中共抗日的决心和取得最后胜利的愿望,借揭露南明政府的黑暗和妥协来影射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动摇。史实派虽然也有自己的历史观,但其基本取向就是搜集史料和“史实呈现”,事外之义的表达并不活跃。与此不同,史观派则运用唯物史观和新史学方法,在陈述史实同时,议论纵横,文思敏捷,更多地表达了“南明”语境的社会性涵义。他们把自己所代表的政治力量视为晚明—南明时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历史镜像,而把国民党政府看作南明政府的历史镜像。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翦伯赞随即发表《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指出“史可法与李自成所领导的斗争,虽然在主观的动机上各不相同;而在客观上,则都尽了抵抗外族侵略的历史任务。”满清的“一贯政略”就是“拉拢一个中国势力,打倒另一个中国势力,阻止中国的民族战线之形成,以达到其各个击破的阴谋”,^①以此隐喻现实中国国民党政府制造分裂的政治风险。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认为晚明政权是“在李闯、张献忠等流寇与满族的旗兵,内外交侵之下,竟以覆灭”,^②影射现实中的共产党人。郭沫若则发表《甲申三百年祭》,反驳蒋介石的观点,指出明朝灭亡是腐败无能的崇祯皇帝和晚明政府的责任,并正面赞颂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的历史功绩。翦伯赞也写了《桃花扇底看南朝》予以响应,用南明的史实证明郭沫若的论断。1945年4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中共“七大”上提出“联合政府”主张,意在反对蒋介石“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翦伯赞随即发表了《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指出:弘光、隆武两朝政府,完全是明代残余官僚士大夫的政府,“没有把政权建筑在广大的人民基础之上”;而桂王政府则是“官僚士大夫和被称为‘流寇’的农民军,下至塾师,游客,卜筮,胥吏,寒士,落魄书生,江湖豪侠以及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大众之政府。换言之,桂王政府,是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民之混合政府”。正因“桂王政府变质为混合政府,所以他才能在更恶劣的客观环境中,支持十六年之久”。^③以南明永历的“混合政府”来隐喻共产党所期待的“联合政府”。在这种“南明”语境中,讨论的是南明历史,所指的是当下的社会现实。

隐喻中蕴含着真实的现实诉求。史观派史学虽然高度肯定农民军的历史功绩,但亦深知农民阶层的局限性,因此,期望克服农民军骄傲自满的旧弊,经受“进京赶考关”的考验,这也是左派政治力量的期望。郭沫若在逃难香港时,看见南宋皇帝赵昀身故的宋皇台遗迹,担心南宋、南明的历史悲剧重演,就像历史之流“打回旋一样”,因此,产生了“冲破那种回旋,不让历史重演”的迫切的现实责任感。^④冲破巨流回旋,超越历史轮回,正反映了史观派“走出南明”的现实追求。他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用群众史观取代英雄史观,关注晚明—南明社会下层的革命,摆脱了旧史学的窠臼和传统困境,尝试实现新史学的转型和现代超越。

当然,史观派的“史学隐喻”,有明显的“以古喻今”特色。它在显示出强烈的政治性、战斗性的同时,也存在影响史学平允表达的遗憾。对此,翦伯赞作了反思“我在解放以前,也常用以古喻今的

① 翦伯赞《论南明第二个政府的斗争》,《中苏文化》第8卷第1期,1941年1月。

② 蒋介石《中国之命运》,正中书局1943年版,第13—14页。

③ 翦伯赞《南明史上的永历时代》,《中华论坛》第10—11期,1945年12月。

④ 郭沫若《洪波曲》,《郭沫若选集》第1卷下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4—106页。

方法去影射当时的反动派。其实这样以古喻今的办法,不但不能帮助人们对现实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认识。”^①

结 语

抗战爆发后,大批流落西南的知识分子有了切身的“南渡”体验,从而激发对南明历史的普遍认同,形成了空前的“南明”语境和明显的“史学隐喻”,产生了强烈的历史代入感:不同政治力量都在南明史中寻找自己的历史镜像,并反观自身,以作出相应的现实对策;而不同的学术派别受政治力量和个人观念的影响,对南明史进行了各自的史学表达。如果说史实派的表达方式是“史实呈现”的话,那么史观派的表达方式就是“史观引领”。史实派坚持以南明帝王为中心,以纪传体为体裁,对南明史进行书写,把国家的命运寄托在政府身上;史观派则反其道而行之,以农民起义军为中心,以唯物史观、阶级分析为方法,对晚明—南明史进行论述,把民族的命运寄托于下层人民的革命。前者的南明史书写是“走进南明”,甚至沉陷其中;后者的南明史研究则在走进南明之后,尝试寻找“走出南明”的新路径。史观派将晚明灭亡的原因归结为政府的腐败,为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树立合法性,“这在当时是一个创举”,^②对史料派中的柳亚子产生了深刻影响。柳亚子本与史观派的见地多有不同,正如叶楚傖所说的那样,“君(指柳亚子)帝南明甚正,郭公帝闯王。”^③但随着柳亚子与国民党交恶,与中共亲近,其南明史观开始倾向于历史唯物主义,对郭沫若“尊大顺永昌皇帝李自成为农民革命军领袖,尽翻史家旧案”表示赞赏。^④与史观派一样,柳亚子也开始尝试“走出南明”,在《现在的中国会等于明季吗?》一文中,通过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发现“明季没有我们现在的先进民众”和“现在的国际环境”,从而断言“现在的中国是决不会蹈明季覆辙”。^⑤部分史实派与史观派合流,凝成了足够冲破“历史洄漩”的合力。

(作者谢贵安,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邮编:430072)

(责任编辑:敖凯)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翦伯赞《关于历史人物评论中的若干问题》,《新建设》1952年第9期。

② 齐雪《1944年国共两党关于纪念甲申三百年的政争》,《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6期。

③ 柳亚子《南社、新南社临时联合雅集社友题名录跋》,张明观编《柳亚子史料札记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4页。

④ 柳亚子《南社、新南社临时联合雅集社友题名录跋》,第284页。

⑤ 柳亚子《现在的中国会等于明季吗?》,转引自张明观《柳亚子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

The Diversit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the Studies of Local Judicial Systems of the Qing Dynasty // Deng Jianpeng

There are three main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studies on county magistrates' judicial judgment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first one is to treat individual cases as general. The second is to confuse ideas embedded in judicial judgment texts with judicial practice in some studies. The third is to adopt a single judicial document, which only explores a certain aspect of local judicial practices. There are a variet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concerning judicial judgments of local official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different types of documents mostly reflect one aspect of judicial judgments in a specific region at a specific time. It is crucial to discern the nature of these historical documents. In other words, only by making references to various types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by a comprehensive review, we can approach a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normal state of judicial practices of the Qing dynasty at the county level. Therefore, we should reconstruct real judicial scenes theoretically and methodically based on textual analysis of relevant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the study of judicial practices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Formation of "Southern Ming" as a Historical Reference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Xie Guian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went into exile to the Southwest. They gained personal experience similar to the one that Chinese intellectuals had when they "crossed the river to the south" after the Manchu conquest. They became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which was the regime founded by Ming loyalists in exile. This "Southern Ming discourse" became popular, and connected the experiences of various sectors in society to historical reference. Different political groups were looking for their own mirror images in Southern Ming history, so as to respond to what happened in reality. Different academic groups, influenced by political affiliations and personal ideas, forged their own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Southern Ming history. The School of Historical Empiricism took "the presentation of historical facts" as its mode of narration, while the School of Historical Theories took "the guidance of historical views" as its mode of expression. The former placed the destiny of the country on government and focused on the emperors,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southern Ming dynasty as biographies. The latter trusted the fate of the nation on the revolutions of the lower classes, and it centered on peasant rebellions by adopting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class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history of the late Ming and Southern Ming dynasty.

To Clear Away the Fog of Historical Nihilism // Zhang Bo Sun Zhaoyang

In recent years, in the face of continuous criticism and exposure, historical nihilism has shifted from direct dominance to implicit resistance. The techniques of its infiltration and spread are more cunning and secretive, and its nature of deception and bewilderment is getting stronger.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always maintain a high degree of vigilance, accurately analyze the strategies and techniques of historical nihilism infilt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We need to fully understand its political direction, realistic hazards, and take solid and powerful measures to resist and respond to its assertion, so as to effectively maintain the national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ideological security.

Food History Studies in the West: Paradigms and Their Shifts // Fu Youqiang

Foo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bstances for human survival. The study of food history help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hanges of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their cultures. In the West, food history as a